

#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Activation of the Tibet-Khams Channel

清初的涉藏信息知識輸送與康藏通道的啓用

Li Zhiying

李志英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Qing government lacked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Tibetan and Mongol regions. As time passe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regions gradually improved. In this context, the Tibet-Khams channel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for ob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Tibet and Mongolia when the Qing government controlled the Tibetan areas. Especially in the two major operations to expel the Jungars and pacify the Lobzang danjin rebellion, the channel quickly became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Qing and the local Tibetan and Mongol governments.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open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channel. However, its role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s to date not been extensively researched.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combines Chinese, Tibetan, and Manchu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discuss the channel's plac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ngol tribe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ibet during the Qing.

摘要：在清朝初期，清政府缺乏关于西藏和蒙古地区的信息和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这些地区的信息和知识逐渐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当清政府控制藏区时，康藏通道在获取有关西藏和蒙古的信息和知识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驱逐准噶尔和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两次重大行动中，该通道迅速成为清朝与西藏地方和蒙古之间传递信息和知识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通道的开通，以及通道的特点和功能。但是，它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传递中的作用，至今没有得到广泛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结合汉文、藏文和满文的历史文

献，讨论了该通道在清朝中央政府在获取蒙古和西藏地方信息和知识传递中的地位。

通道和驛站在輸送信息和地方性知識中起着十分關鍵的作用，中國古代社會尤其是如此。清初，清朝中央政府對藏地及蒙古諸部的信息知識匱乏而充滿渴求。在與二者接觸、往來過程中，清朝對二者的信息和知識傳輸處於不斷摸索和完善的過程中。康雍時期從成都和滇西，途徑康區入藏道路（下文簡稱康藏通道）即為一例。在清朝中央政府實現直接統治藏區過程中，這一通道在獲取西藏地方和蒙古諸部信息、知識方面的作用日益顯著。尤其是在驅準保藏和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兩大行動中，康藏通道逐漸成為了清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及蒙古諸部傳輸信息和知識的重要孔道。石碩、王麗娜研究了打箭爐入藏道路的背景、啓用過程，以及該通道在清朝治理西藏乃至整個藏區中的戰略意義。<sup>1</sup>趙心愚及鄒立波則詳細梳理了清前期在這一通道上汛塘和糧臺的設置情況，併強調這些設置對清朝傳遞軍情的重要作用<sup>2</sup>，但由於材料有限，對於康藏通道在溝通和傳遞中央與西藏地方信息方面的作用研究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筆者擬結合漢、藏、滿等多語種史料，探討康藏通道在清朝初輸送蒙古諸部和西藏地方政府信息、知識中發揮的作用及其啓用過程。

### 一、康雍時期的康藏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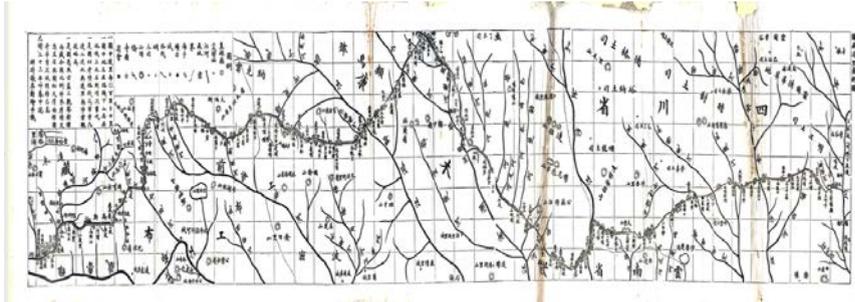
清朝入藏道路主要由青藏（青海-西藏）、川藏（四川-西藏）、滇藏（雲南-西藏）三道組成。其中，川藏和滇藏兩路均經康區入藏，二者啓用時間較為接近<sup>3</sup>，因此筆者將二者合併稱為「康藏通道」，以便下文討論。康藏通道的川藏道在康雍時期併沒有固定的稱謂，僅以道路上

<sup>1</sup> 石碩、王麗娜。清朝「驅準保藏」行動中對由打箭爐入藏道路的開拓。中山大學學報 2018（3）：136-46。

<sup>2</sup> 趙心愚。清康熙雍正時期川藏道汛塘與糧臺的設置及其特點。民族研究 2019（2）：117-24；鄒立波。清代前期康區塘汛的設置及其作用與影響。西藏研究 2003（3）：28-35。

<sup>3</sup> 在這裏的啓用是指被納入清代官方通道使用的情況，而非民間使用情況。實際上，此二道在民間層面一直是商賈、僧侶往來的重要道路。未曾註明時間的《曼隆上師遊記》就曾提到過經打箭爐進入四川成都，從重慶沿江而上進入南京曾是明代僧人前往內地的路線之一。參看：*Rmi lam brdzun bshad sgyu ma'i sgra dbyangs chen mo*（抄本），BDRC: W1KG13947。《安多政教史》也曾描繪青藏道路受白利王等人的阻攔無法通行時，有志之士選擇從打箭爐入藏的情況，參看：智觀巴·貢卻乎丹巴繞吉著，吳均、毛繼祖、馬世林譯。安多政教史。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89：39；王海兵。跨越大渡河：明至清初四川南路入藏茶道的市場變遷。中華文化論壇 2017（5）：108-14。

一些比較眾所周知的城市，如理塘（有時寫作裏塘）、打箭爐（今四川省康定）、豐爾格（德格）等來代表這這一線路。關於這一線的起點，有成都和打箭爐兩種說法<sup>4</sup>，這是清代地方志書寫傳統不一致所致。如光緒年間繪製的一些輿圖中就將起點定為打箭爐，取起點打箭爐之「爐」字與終點西藏拉薩之「藏」字，稱這一道路為「爐藏道」<sup>5</sup>，這與年羹堯（1680—1726）所定的起點是一致的。



光緒《爐藏道裏新考》中的「爐藏道」

總之，在康雍時期，由川入藏一線的康區部分為打箭爐至西藏拉薩一線，這一線又主要可分為南線和北線<sup>6</sup>。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羹堯所記載的南線線路為：打箭爐（Dar rtse mdo）—裏塘（Li thang）—巴塘（Ba' thang）—乍丫（Brag g.yab）—察木多（Chab mdo）—擦瓦崗（Tsha ba sgang）<sup>7</sup>—書班多（碩般多，Sho pa mdo）—招地（拉薩）<sup>8</sup>。同一時期的滿文方誌《喀木地方一統誌》（wargi k'am ba-i i tong jy）、王師我的《藏爐總記》等均零星提及到南線中的幾個重要城市，如巴塘、理塘、打箭爐等，但並未完整記載南線的線路<sup>9</sup>。噶爾弼（?-1727）驅準保藏時進藏的路線與年羹堯所提及的一致<sup>10</sup>。但成書於雍正五年前

<sup>4</sup> 趙心愚. 清康熙雍正時期川藏道汛塘與糧臺的設置及其特點. 民族研究 2019 (2): 117.

<sup>5</sup> 張其勤. 爐藏道裏新考. 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 1935.

<sup>6</sup> 阿音娜通過道光年間的一副西藏彩繪地圖指出，川藏道實際上由南、北、中三線，因中路一線在康雍時期並未被官方大規模使用，故本文未予以討論。參看：阿音娜. 輿圖中的川藏交通—解讀清末彩繪地圖《西藏全圖》. 西藏研究 (2011 (1)): 48-55.

<sup>7</sup> 關於這一地名的歷史沿革及其具體所指，見：貢布多加. 康區擦瓦崗歷史沿革及其地名稱謂考究—基與對口述史料的文獻分析. 西藏研究 2020 (1): 18-29. 大體而言，主要指的是在怒江和瀾滄江中間地帶，今之西藏左貢-八宿-然烏縣境內。

<sup>8</sup> 季永海、李盤盛、謝誌寧等. 年羹堯滿漢奏折譯編.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203.

<sup>9</sup> 張開. 從滿文《喀木地方一統誌》看清廷對康區的地理認知. 中國藏學 2019 (3): 165-79.; 王我師. 藏爐總記.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三帙.

<sup>10</sup> 石碩、王麗娜. 清朝「驅準保藏」行動中對由打箭爐入藏道路的開拓. 中山大學學報 2018 (3): 136-46.

後的《藏紀概》在打箭爐和理塘之間加上了中渡（*Nyag chu*）一城，並更加詳細地記載了南線具體線路為：瀘定橋—打箭爐—折多—瓦吉山（瓦切關廟）—五龍石（臥龍石）—高日寺山—八角樓—中渡（雅江）—麻蓋中夾溝—鴨龍江—峩洛山—漢人橋—理塘—海子（幹海子）—喇嘛丫—立登三巴（三霸）—大所封（大朔山）—大所—小巴沖—巴塘—竹巴龍—猛裏山（沿金沙江）—漢人寺—普拉山—江卡至今昌都境內而入藏<sup>11</sup>。大體而言，這一線主要經過打箭爐—中渡（今雅江）—理塘——巴塘—昌都—拉薩。該線雖道迂山險，但路程短，沿途口糧、牲畜補給較為充足，一直是由康入藏的主線，也是「蠻客」往來於東部藏區和西藏之間的主要路線，使用率較高。康雍以後，根據乾、嘉、道出版的一些相關道裏圖考來看，該線路雖在一些小的地方有所變化，但仍舊維持着以打箭爐——中渡（今雅江）——理塘——巴塘——昌都——拉薩等城市為主線<sup>12</sup>。

此外，年羹堯在其奏疏中還提及了與南線相對的北線：

自打箭爐由霍耳、由得爾革、由春料爾，由詔烏、由春科納魯、由索克贊丹袞廟、由那出而至招地，此北路也。路平，近有水草，少居民，雖雲無柴而皆言牛馬糞可燒。

<sup>13</sup>

大體而言北線為打箭爐—霍爾（*Hor*）—得爾革（德格，*Sde dge*）—春料爾—詔烏—由春科納魯—索克贊丹袞廟—那出（那曲，*Nag chu*）—招地（拉薩）。其中霍爾則包括清代五霍爾之地（一說七霍爾），即今道孚、爐霍、甘孜等主要地區<sup>14</sup>。但該線較南線而言，路途雖平坦，但裏程遙遠，沿途補給困難，且時有夾坝（*jag pa*，盜匪）出沒，清代官方使用率並不高。因而雍正五年的《藏紀概》並未記載這一線路。

在平定羅布藏丹津叛亂中和七世達賴喇嘛移駐噶達惠遠寺（*Mgar thar byams pa gling*, 1730-5）期間，北線使用較多，但仍舊不被作為首選路線。例如土爾扈特部使團於 1731-1732 年進藏熬茶期間，因要前往泰寧拜謁達賴喇嘛（*Bskal bzang rgya mtsho*, 1708-57），獻禮請汗號，故

<sup>11</sup> 李鳳彩《藏紀概》。北京：國藏學出版社，1995：23-28。原書並無頁碼，此頁碼為筆者註，從正文計算。

<sup>12</sup> 佚名。《乾隆西藏志》。北京：國家圖書館館藏，2010；西藏研究編輯部編。《西藏誌·衛藏通誌合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等。

<sup>13</sup> 季永海、李盤盛、謝誌寧等。《年羹堯滿漢奏折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203。

<sup>14</sup> 趙爾巽撰。《清史稿·土司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14224；[法]古純仁（F. Gore）著，李思純譯。《川滇之藏邊川邊霍爾地區與瞻對》。《康藏研究》1948（18）：21-8；甘孜藏族自治州概況編寫組編委。《甘孜藏族自治州概況》。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85。

而清廷安排他們從打箭爐到泰寧，經北線入藏，亦計劃讓土爾扈特部使者沿此線返回，但因去程險象叢生，準噶爾使團返回時堅決不從此路返回<sup>15</sup>。康熙以後的許多方誌、道裏考著作中對這一線的描述也較南線簡略，因而北線的使用率遠不及南線。

關於滇藏一線，一些學者已根據《藏行紀程》指出，由滇入藏之路線主要包括：香格裏拉 (Rgyal thang) —德欽 (Bde chen) —左貢 (Mdzo sgang)—八宿 (Dpa' shod)—洛隆 (Lho rong)—拉薩<sup>16</sup>。這是根據康熙末年入藏杜昌丁入藏敘述而勾勒的主要線路。根據《藏紀概》所載，其詳細路線為：小中甸—菁口—大中甸—湯村—泥噶—橋頭—蔔自立（即奔子欄）—阿墩子—至察木多巴宿、洛隆宗一路入藏<sup>17</sup>。

這三線作為清初康藏通道的主要線路，因其啟用時間各不相同，使用程度也不盡相同，對於收集信息的重要程度也差異盛大，文章擬用分兩個部分進行討。

## 二、川藏南路及滇藏線的信息開拓與信息輸送

打箭爐入藏一線作為清朝獲取藏地知識和信息的通道，最初主要指南線，這一線在西爐之役後已略具雛形。1701-1702 年間，清朝中央政府通過西爐之役，牢牢控制了打箭爐這一交通、貿易要道，並與和碩特蒙古定界於中渡（今雅江）<sup>18</sup>，將其勢力推進至雅礱江一帶，並將內地驛站自瓊州延伸至打箭爐一帶<sup>19</sup>。在清廷控制打箭爐後，達木巴色爾濟、郎中舒圖、員外鐵圖被遣駐打箭爐，與西藏地方政府所遣之大喇嘛一同監管貿易<sup>20</sup>。值得注意的是，所遣駐爐官員中的達木巴色爾濟（*damba serji*），是往來於清朝中央政府和藏地間一位重要的喇嘛，其作為副教習，精通藏文、滿文，在清朝中央政府處理西藏地方事務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根據滿文文獻記載，其為欽差，主要負責管理打箭爐事務及監管貿易（*da jiyān lu-i ba-i baita be icihiyara. tuwame*

<sup>15</sup> 吳元豐，厲聲。清代新疆滿文檔案漢譯匯（滿文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1): 297-306; 漢文譯文見：吳元豐，厲聲。清代新疆滿文檔案漢譯匯編（漢譯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 125-8.

<sup>16</sup> 張欽。《藏行紀程》所載滇藏交通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20 (1): 128-42.

<sup>17</sup> 李鳳彩。藏紀概。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 23-8.

<sup>18</sup> 西藏研究編輯部編。1982.西藏志·衛藏通志合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8；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載《任乃強藏學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 93.

<sup>19</sup> 黃廷桂等修、張晉生等纂。雍正《四川通志》。欽定四庫全書影印，卷二十二。

<sup>20</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蒙古大學蒙古學院編。Daycing yüriin-ü dotuyadu yamun mongyul bičig-ün dangsa (清內閣蒙古堂檔)。呼和浩特。蒙古大學出版社 2005(16): 566-9.

*hūdašabure lama damba serji*)<sup>21</sup>。除監管貿易外，其還肩負著勘查打箭爐周邊地形，獲取藏地知識和信息之責。在他前往打箭爐上任期間，康熙帝叮囑其「至彼處，當熟諳地方情形」<sup>22</sup>。自達木巴色爾濟始，凡駐打箭爐之喇嘛，皆被要求諳熟地方情形，獲取藏地知識和信息。

這一職責在雍正初年尤為明顯。雍正元年（1723），理藩院和時任川陝總督的年羹堯之間對駐爐喇嘛更替的討論，充分說明了駐爐喇嘛獲取藏地信息和知識方面的職責。理藩院認為當時駐爐喇嘛羅卜藏東羅布（*Lama Lobdzang dungrob < Blo bzang don grub*）「為人糊塗，不能成事，管理彼地事務和探聽消息為緊要，不能讓如此粗忽之喇嘛駐守」<sup>23</sup>。在這裏，清廷將獲取藏地信息和知識作為駐爐喇嘛極為重要的職責，與管理地方事務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年羹堯根據理藩院的要求撤回羅卜藏東羅布，以喇嘛粗勒齊木藏布拉木占巴（*Lama Ts'ulcim dzangbu ramjamb < Lama Tshul khrim bzang po rab 'byams pa*）替換了羅卜藏東羅布，他在奏文中道：

管理打箭爐事務、探聽消息尤為重要。喇嘛粗勒齊木藏布拉木占巴於五月初九日已從西安出發，稍作修整後即行前往打箭爐。只是廣仁寺（*guwang žen sy*）乃聖祖仁皇帝施恩敕建的大寺，只有粗勒齊木藏布拉木這樣的喇嘛駐守才適宜。<sup>24</sup>

<sup>21</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蒙古大學蒙古學院編。《*Daycing yüriin-ü dotuyadu yamun mongyul bičig-iin dangsa*（清內閣蒙古堂檔）》。呼和浩特：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16）/（17）：152-3。

<sup>22</sup> 清實錄（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105。

<sup>23</sup> 滿文原文：*lama lobdzang dungrob. niyalma hūlhi. baita de urunakū. tubai baita icihiyara. mejige gairengge oyonggo. ere gese baita de foihori lama be tebuci ojurakū*。見：奏報駐打箭爐喇嘛消息折（滿文），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輯。《年羹堯奏折專輯》（清字折部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1971：81；季永海、李盤盛、謝誌寧等。《年羹堯滿漢奏折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5；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打箭爐地方任用喇嘛及捕授員外郎同知等官員事。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檔案編號：000631；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20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滿文朱批奏折》（上冊），合肥：黃山書社，1998：125。

<sup>24</sup> 同上。滿文原文為：*da jiyān lu de baita icihiyara. mejige gairengge umesi oyonggo. lama ts'ulcim dzangbu be unggihengge. ++ eduringge ejen umesi hafu sahabi. ts'ulcim dzangbu. sunja biyai ice uyūn de si an de isinjiha be dahame. majige dasatabufi. uthai da jiyān lu de unggireci tulgiyen. damu guwang žen sy serengge. ++ šendzu gosin hūwangdi cohotoi hesei ilibuha ambakan miyoo. ts'ulcim dzangbu-i gese lama bahafi tebuci teni acambi*: 81-82。

由此可知，理藩院和年羹堯共同力薦的喇嘛粗勒齊木藏布拉木占巴，藏文名為：Tshul khrim s bzang po rab 'byams pa，漢文作芻爾齊木藏布拉木渣木巴<sup>25</sup>、楚爾齊母藏布拉木占木巴<sup>26</sup>等，時為駐廣仁寺喇嘛，是一位系統學習過歐洲數學知識，參與岡底斯山的測繪考察的格魯派喇嘛，曾以駐京喇嘛的身份參與《新洋新法曆書》的藏文文本《漢歷大全》(Rgya rtsis chen mo) 校勘工作等<sup>27</sup>。其被重用顯然與其聲名和與康熙帝的熟稔關係有關，但其在傳遞西藏和清廷之間的信息方面作用也是其被重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 1717-1718 年間，他在參與岡底斯山測繪返回拉薩之際，就曾將齊其從拉藏漢處得知的有關準噶爾的消息上報拉清廷<sup>28</sup>。此外，在其前往打箭爐上任期間，見到年羹堯後，年羹堯詢問他西藏地方動態。他向年羹堯報告因清廷給西藏達賴喇嘛所製的印章過小，而導致西藏僧俗不滿，不得不私自取用先前元朝賜給達賴喇嘛的大印的情況，清廷於是重新製作大印，以安撫西藏人眾<sup>29</sup>。

為更好地在打箭爐獲取藏地信息和知識，年羹堯又授依特格爾 (Itegel) 員外郎銜，與拉木占巴一同處理打箭爐事務，獲取藏地信息與知識。依特格爾原為駐爐探聽消息之筆帖式，後任四川成都府理事同知，其理由為：「因為探聽打箭爐信息之事比同知之事更重要」<sup>30</sup>。與此同時，他還令其衙門內八品筆帖式和敏 (Hemin) 與依特格爾一起前往打箭爐，另派章京 (janggin) 一名。如此，清朝中央政府在打箭爐形成了由駐爐喇嘛一、筆帖式二、章京一名組成的辦事人員<sup>31</sup>，這些辦事人員均肩負獲取藏地知識和信息的重要任務。

在雍正以前，清朝還新建瀘定橋，以保證要道暢通。成都前往中

<sup>25</sup> 清實錄·聖祖實錄 (第 6 冊) : 714-5.

<sup>2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 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1985 年，第 8 冊：167.

<sup>27</sup> 關於該人物的生平請參看：孔令偉：《欽差喇嘛楚爾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而本第三分，2021 年 9 月：603-48.

<sup>28</sup> 清實錄·聖祖實錄 (第 6 冊) : 714-5.

<sup>29</sup> 季永海、李盤盛、謝誌寧等. 年羹堯滿漢奏折譯編.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6-7.

<sup>30</sup> 滿文原文為：da jiyān lu-i baita. tungjy-i baita ci oyonggo be dahame. bahaci. itegel be aisilakū hafan-i jergi obufi.

<sup>31</sup> 見：奏報駐打箭爐喇嘛消息折 (滿文)，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輯.《年羹堯奏折專輯》(清字折部分.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1971: 83；季永海、李盤盛、謝誌寧等.《年羹堯滿漢奏折譯編》.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5；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打箭爐地方任用喇嘛及捕授員外郎同知等官員事).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檔案編號：000631；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 20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滿文朱批奏折》(上冊)，合肥：黃山書社，1998: 125.

渡一線中，化林營所隸沈村、烹壩、子牛三大瀘舊渡口，乃為成都至打箭爐必經之要道，為保證要道之暢通，清朝於距化林營八十余裏處安樂地方仿鐵索橋規製建橋<sup>32</sup>。康熙四十五年（1706），瀘定橋建成，康熙移化林營沈村防守千總一員、兵一百名鎮守瀘定橋<sup>33</sup>，成都至中渡一道遂暢通。然而，在西瀘之役後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間，清朝治理重心主要聚焦於西北地區，對於西藏和康區，則一直采取保守策略。因此，打箭爐入藏通道亦僅限在打箭爐至雅江一帶，並未向西推移，打箭爐南線形成完整的藏地信息和知識輸送通道則是在驅準保藏期間（1718-20）。

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月間，蒙古準噶爾軍隊攻占拉薩，清朝軍隊於次年（1718）五月從西寧出發，準備驅準保藏。但作為清朝在西北的勁敵，準噶爾並不好對付，尤其是喀喇烏蘇<sup>34</sup>一役中清軍全軍覆沒，意味著領侍衛大臣金海等製定的駐紮在木魯烏蘇之庫庫塞、多倫鄂羅木等要塞，探聽準噶爾在藏地消息的計劃全面落空，準噶爾在玉樹、達木設置哨所，並在碩般多一帶把守盤詰入藏人眾，清廷從西寧一線入藏探聽消息計劃屢屢受挫<sup>35</sup>，這使得清朝迫切需要開辟一條更為便捷的、安全的信息通道，探聽準噶爾在藏地之消息<sup>36</sup>，以便掌握其動向，作進一步的戰略部署。彼時，經營四川之年羹堯及其派駐打箭爐之溫普經過實地探查，認識到打箭爐及其以外的巴塘、理塘在進藏中將會大有作為，並在打箭爐采取相應措施，以便呼應西寧一線。因此，已有一定經營基礎的打箭爐入藏通道遂被啟用，成為輔助西寧一線探聽準噶爾消息的信息通道。

此外，準噶爾人也注意到該通道的重要性，他們利用康區入藏一線暗中前往打箭爐、中甸等地探聽清朝方面的消息。拉藏汗所轄的理塘營宮喇嘛與策零敦多布暗通密信，企圖與準噶爾所遣之達哇朗章巴等

<sup>32</sup> 載西藏研究編輯部編. 禦製瀘定橋碑記. 載：《西藏誌·衛藏通誌合輯》. 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133-4.

<sup>33</sup> 清實錄·聖祖實錄(第6冊): 265.

<sup>34</sup> 滿文作 Kara usu 或 Hara usu，意為黑色的河，是那曲河（Nag chu）滿文音譯。

<sup>35</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 令侍衛內大臣金海等奏報進剿策旺喇坦布計劃折.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折全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4): 1329.

<sup>36</sup> 此外，西藏西部的拉達克（La dwags）也是清朝探聽準噶爾消息的重要媒介。參看 L. Petech, *The Kingdom of Ladakh: C. 950-1842 A.D.*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 81-95; 齊光. 2014. 拉達克與 18 世紀前半期的清朝、準噶爾在西藏的角逐. 歷史地理 (2): 206-14; 齊光. 清朝的準噶爾情報收取與西藏王公頗羅鼎家族. 中國邊疆民族研究 2017 (1): 88-109; 孔令偉. 1724-1768 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臥爾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 清史研究 2018 (2): 27-48; 陳柱. 驅準保藏與清朝和拉達克的最初關係. 中國藏學 2019 (1):157-66.

會謀把持理塘<sup>37</sup>，至 1718 年 5 月，準噶爾五百人已屯積於昌都境內，並與理塘察罕丹津所遣之寨桑暗自通謀<sup>38</sup>。康熙五十七年（1718）閏八月年羹堯和法喇又探查發現：準噶爾策零敦多布讓心腹第巴大克咱派遣營官獨日結洛丁與義馬兩人，以管押「蠻客赴爐貿易」為由，前往打箭爐探聽消息。<sup>39</sup>這使清廷意識到，採取準噶爾消息必須將打箭爐一線納入考慮之中。同時，通過年羹堯對獨日結洛丁等人審訊得到了不少準噶爾在藏之消息，也使清廷清楚地看到了在打箭爐一線探聽準噶爾消息的重要性。於是，年羹堯命護軍統領溫普、打箭爐稅差、理塘領兵官員等，在打箭爐一帶加強探訪準噶爾消息。但這僅是官方探查，規模並不大，且主要是針對來康區之準噶爾人。大規模啟用這一線的哨探始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九月十九日。清廷在四川之打箭爐、雲南節達木、鹽達木（即今中甸）、叉木多等多地重金招募哨探，前往西藏採取準噶爾和西藏方面的消息：

咨行我等雲南、四川之打箭爐二路之所駐大臣、喇嘛、蒙古章京等，由彼處尋土伯特、阿木多（安多）、唐古特地方喇嘛數人，多給尹等盤費，由打箭爐，雲南之節達木、鹽達木（中甸）、叉木多（昌都）抵招地（拉薩），喇錫倫布（紮什倫布寺），叩拜廟、佛、班禪、喇嘛等，秘密攜書致佛克達班禪、第巴拉紮裏等，曉諭若送行文前來，充足賞賜等情。<sup>40</sup>

從其探聽消息的路線安排來看，清朝意圖全面啟用川藏和滇藏二線，重金招募喇嘛<sup>41</sup>、章京，借拜佛朝聖名義前往後藏紮什倫布寺給班禪送信，一方面沿途獲取準噶爾和藏地信息。康熙五十八年（1719）正月初三胤祉奏疏提到：

四川松潘、打箭爐、雲南中甸等處探信喇嘛、章京等，

<sup>37</sup> 黃廷桂等修、張晉生等纂。雍正四川通誌。欽定四庫全書影印，卷二十一-西域。

<sup>38</sup> 清實錄·聖祖實錄(第 6 冊): 734.

<sup>39</sup> 季永海、李盤盛、謝誌寧等。奏陳獨日結洛丁供西藏情形折。熙五十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年羹堯滿漢奏折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198.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4 (2): 321.

<sup>40</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1996。為征繳準噶爾軍所發上諭一道。康熙五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折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4): 1330.

<sup>41</sup>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喇嘛並非是族群意涵之下的藏族喇嘛，而是指崇信藏傳佛教的僧人，包括漢人和蒙古人等。參看：Hoong Teik Toh, *Tibetan Buddhism in Ming China*.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4: 202-18.

屢探西地消息，一面稟報各地辦理軍務大臣，一面奏聞。

42

從中可以看出，清朝不但重金招募到了哨探，還使其多次前往拉薩探聽和收取消息。這些喇嘛章京將探聽到的消息除直接奏報給當地的軍務大臣，還可直接上奏康熙，可見情報探聽之重要。然而，雖然年羹堯、法喇、溫普等人在康熙五十七年已開始著手經營打箭爐、巴塘、理塘，但就打箭爐南線而言，巴塘、理塘仍控制在和碩特蒙古手中。在此背景下，年羹堯建議出兵招降這些地區，著手經略康南一路。於是清廷沿途招撫番民，籌措糧草，並妥善安排蛇蠟渣巴之嫡女桑結承襲明正之位，翟升年羹堯為四川總督，給予兵權，遣荊州之滿洲兵一千前往成都駐紮，預備來年進藏剿滅準噶爾事宜<sup>43</sup>，並令化林守備羅雄募補兵缺<sup>44</sup>。對南線之進駐要地——理塘、巴塘、察木多、巴爾喀木 (Bar khams)<sup>45</sup> 等處，遣人曉諭「堅守各自地方、勿降勿容準噶爾」，否則將出兵取其地而統之<sup>46</sup>。

<sup>42</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折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1351.

<sup>43</sup> 清實錄-聖祖實錄(第6冊): 751.

<sup>44</sup> 季永海、李盤盛、謝誌寧等。年羹堯滿漢奏折譯編, 1995: 200.

<sup>45</sup> 關於「巴爾喀木」，年羹堯曾提到：在巴爾喀木地方的唐古特番子裏，有羅蔔藏丹津所屬繳納貢賦部落（滿文為：*bark'am-i bade bisire tanggūt fandzi-i dorgi de. lobdzang danjin-i harangga alban afabure aiman bi.*），其中的 *bark'am* 可能是藏語 བར་ཁམས 的音譯，即中部康區。據筆者目前看到的藏文材料，該地名最早出現在五世達賴喇嘛的著作中，其撰於 1643 年的《西藏王臣記》中首次提到了位於 Bar khams kyi rgyal po，其後《青海史》、《安多政教史》、《黃琉璃》、《土官宗派源流》等藏文教法史亦多次提到這一地名。參看：Sum pa Ye shes dpal 'byor, *Chos 'byung dpag bsam ljon bzang*, Lanzhou: Kan su'u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92: 659 ; Rgyal mo 'brug pa, "Bod kyi lo rgyus steng gi be ri dang be ri rgyal po'i skor la dpyad pa," *Krung go'i bod rig pa* 2012 (2): 47-65; Chab mdo Shes rab, *Mdo khams chu bzhi sgang drug la dpyad pa'i gtam stong thun chen mo*, In: *Stong thun chen mo in chab mdo'i yig tshang rin chen spungs pa*, Delhi: 'Phags yul chab mdo lo rgyus rtsom sgrig khang , 2006: 457 ; 趙心愚。清代早期方誌中的「康」及有關記載特點。藏學學刊 2015 (13): 123-37 ; 石碩。藏族三大傳統地理區域形成過程探討。中國藏學 2014(3): 51-9 ; 石碩。試論康區藏族的形成及其特點。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1993 (2): 22-8 ; 高琳。2013。藏族三大人文地理區劃之一：「康」(Khams) 之概念與區域形成演變研，四川大學博士論文；高琳。7 世紀中葉—19 世紀格魯派史籍中的康地。西藏大學學報 2013 (1) : 93-7 ; 黃維忠、王維強。藏文 Mdo gams 和 Mdo khams 考。民族研究 2004(1) : 87-91 ; E.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Fragments Towards the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From the 13. to the 17. Century, Volume 2*, London: Routledge, 2000: 21-4.

<sup>4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折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但僅這些修好和招撫措施還不足以讓清廷保證康區進藏路線的暢通，為籠絡和利用青海和碩特平定準噶爾之亂，康熙許諾青海和碩特進軍西藏成功後，將從固始汗子孫中冊封「持教法王」。二者達成協議後，當時居住於理塘、巴塘至叉木多(Chab mdo)和中甸(Rgyal thang)一線，受和碩特直接或間接支配的“番人”理所應當的成為了和碩特需要防禦和戍守之對象：

理塘、巴塘、柴達木、延達木、散達木、喀木等處，既然俱系青海臺吉所屬征賦諸申，行文駐西寧都統延信等，繕文宣諭青海臺吉，今準噶爾車凌敦多布等既然在招地，遣人往巴爾喀木等處，占有爾等所屬地方諸申，不可料定。爾等酌情各遣可靠之人戍駐，倘準噶爾人前來，即率爾等所轄諸申之兵丁剿殺，斷不允準噶爾奪取地方諸申。<sup>47</sup>

理塘、巴塘、柴達木、延達木<sup>48</sup>、散達木、喀木<sup>49</sup>皆系康區進藏要道，亦為青海和碩特蒙古所屬。是否能獲得青海和碩特蒙古力量的支持，對清朝這些地方駐軍尤為關鍵。於是，清廷根據十四皇子允禩(1688-1755)的建議，先以一隊滿洲綠旗官兵前往駐守，料理拉藏汗及達賴喇嘛所屬之人，待軍務完竣後再議其歸屬問題。康熙五十八年(1719)四月十六日，其與察汗丹津商議後，由小靈童噶桑嘉措(Bskal bzang rgya mtsho, 1708-57)、察汗丹津分別派人前往理塘、巴塘曉諭其眾，接受清朝滿洲駐兵，以免滋生事端<sup>50</sup>。

此舉與年羹堯在川省所做準備遙相呼應，為清廷駐軍巴塘、理塘奠定了基礎。實際上，法喇(?—1735)早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已認識到了誕生於理塘的達賴喇嘛靈童對於招撫理塘至關重要的作用。

---

1996 (4): 1351.

<sup>47</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4): 1330.

<sup>48</sup> 柴達木、延達木、散達木為「結打木、揚打木」，即中甸、德欽等地，見鄧銳齡. 結達木、楊達木二城考. 中國藏學 1998 (2): 32-41.

<sup>49</sup> 此處的喀木(Khams)並非是藏族傳統地理意義上的多康地區或邊地，而主要是指叉木多地區，即昌都地區。在《清史稿》中載：「康，一曰喀木。要塞曰察木多。在前藏東千二百五十裏，東界四川，南界珞瑜境及英屬阿薩密，西界衛地，北界青海，喀木今日昌都，亦稱前藏，本屬呼圖克圖」。見：《清史稿》卷八十，誌十五，地理二十五. 北京: 中華書局, 1996年，第二四七二頁；此外關於這一區域概念在清代的演變見：趙心愚. 清代早期西藏方誌中的「康」及有關記載特點. 藏學學刊 2015 (13): 123-37.

<sup>50</sup> 吳豐培編. 撫遠大將軍允禩奏稿. 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1991: 30.

在其建議下，清廷一面遣人前往理塘宣諭聖德，解釋清朝進駐的原因；另一方面，聯系達賴喇嘛之父，讓其遣人一同與清朝所遣之人前往理塘曉諭僧俗民眾。達賴喇嘛之父所遣之人於同年六月二十九日抵達理塘，此時法喇所遣之人已到理塘一月有余<sup>51</sup>。這些舉措無疑對清廷進入理塘地區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此外，清廷還切斷一切通往西地的布匹、茶葉等物品供應和運出。其中包括切斷康區理塘、巴塘、中甸等地之茶葉等物品供應<sup>52</sup>。在一番準備後，康熙五十八年三月，清廷決定於青草發時，讓法喇「領兵前往，招撫裏塘、巴塘」<sup>53</sup>，年羹堯則駐牧打箭爐及松潘要地。

清軍在理塘大獲全勝後，巴塘隨之歸附<sup>54</sup>。巴塘歸順寨堡三十三處，歸順頭人多達三十九名，屬民計六千九百二十戶，另有大小喇嘛二千一百余眾。隨後，鄰近理塘的乍丫、察木多、噶哇（Rdza yul,今察隅）等呼圖克圖相繼歸附，清廷給予重賞，頒賜印信<sup>55</sup>。至同年四月，岳鐘琪（1686-1754）率兵四千已在昌都駐守，四月九日抵達洛龍宗，並抓獲準噶爾部寨桑，招撫部分洛龍宗土目及屬民<sup>56</sup>。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六月初六日，阿爾布巴攜碩般多、洛隆宗等地城官使者歸附，並繼續為大軍南下擔任向導<sup>57</sup>，在當地首領的幫助下，清軍很快擊敗1719年前來此處攔截四川兵丁的寨桑托克托，控制了碩般多、洛隆宗、察木多三城，並進一步南下，於是打箭爐至拉薩南線隨之啓用。

在經略康區南線入藏要道的同時，滇藏通道亦被納入經略中。滇藏道路的開通主要是通過控制中甸地區完成的。康熙五十七年，康熙以雲南地方近蒙番，令其備兵<sup>58</sup>，併著手經營中甸。由於中甸離巴塘、理塘距離較近，為策應剿撫理塘、巴塘一帶，康熙五十八年六月，都統武格（?-?）被遣至中甸，偵探準噶爾消息，並酌量帶兵接應理塘、巴塘之法喇<sup>59</sup>。都統於同年十二月抵達中甸，沿途勘查進藏路線，在調查中發現「紮雜口乃通西之路，奔雜拉渡口乃通金沙江之渡口。此二

<sup>51</sup> 同上: 62.

<sup>52</sup> 和碩誠親王胤祉等奏為辦理軍務折。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一日。載《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匯編: 1351》；《胤禛奏辦理裏塘戶口茶等情折》，康熙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載《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匯編》: 1424-15.

<sup>53</sup> 清實錄·聖祖實錄(第6冊), 768.

<sup>54</sup> 陳登龍編. 嘉慶十五年抄本. 裡塘誌略. 臺北: 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0: 9-10.

<sup>55</sup> 黃廷桂等修、張晉生等纂. 雍正. 四川通誌. 欽定四庫全書影印, 卷二十一. 西域; 清實錄·聖祖實錄(第6冊): 781-2.

<sup>56</sup> 吳豐培編. 撫遠大將軍允禔奏稿. 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1991: 162-3.

<sup>57</sup> 同上: 142-4.

<sup>58</sup> 倪蛻輯, 李埏校點. 滇雲歷年傳. 昆明: 雲南大學出版社, 1992: 222.

<sup>59</sup> 清實錄·聖祖實錄(第6冊): 776.

口俱系通西最要之路」<sup>60</sup>。其中，紮雜口一路由天竺寨至叉木多，奔雜拉渡口即奔子欄渡口，又稱「卜立」渡口，主要由阿墩子至昌都巴宿、洛隆宗一路入藏，武格在兩渡口分別各派兵二十加以防守。中甸原本在和碩特控制下，自 1710 年免派宗官後，地方權力一度旁落至松贊林寺 (Dga' ldan sum rtsen gling) 之手，致使該地和碩特統治較為松懈。隨著武格等人的到來，在中甸蒙古營官隨之選擇歸附清朝。康熙五十九年，都統五阿哥、副都統吳納哈等領兵出金沙江，中甸至藏通道正式啟用。同年二月，中甸、巴塘、理塘劃歸滇省管轄，四月又因為糧草供應問題，巴塘、理塘暫歸川省管轄<sup>61</sup>。至此，打箭爐至藏南線及中甸入藏通道基本啟用，清朝中央政府勢力由雅礱江以東進一步推進至西邊之理塘，直至金沙江之巴塘、叉木多及中甸一帶。康熙五十九年四月，清軍正式兵分兩路進藏平定準噶爾之亂，康區打箭爐至藏南路及滇藏一線正式開通。

### 三 打箭爐北線的信息輸送與開通

由打箭爐經霍爾、得爾革（即德格）<sup>62</sup>一線入藏線路大體與今由康北入藏路線基本相同。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年羹堯為防禦準噶爾，已在霍爾一線做出相應的防禦措施，並在《預備進藏兵數折》中，將該線路與南線並列列出，試圖作為率軍入藏路線加以考慮，但這一線並未在驅準保藏行動中得到啟用。其作為信息輸送渠道及進藏要道正式啟用始於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行動中。1723 年，羅卜藏丹津發動叛亂。清廷基於準噶爾叛亂中從康南一線及滇藏一線進兵的成功經驗，將打箭爐南北二線、滇藏一線，共計三線全部納入圍剿羅卜藏丹津的重要進軍路線中。

其中，打箭爐北線被納入信息輸送要道推動者岳鐘琪和周瑛。雍正元年四月初，雲貴總督高其倬（1676-1738）得到線報稱青海諸臺吉已在青海集結兵力，準備反叛<sup>63</sup>。為進一步獲取羅卜藏丹津信息，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岳鐘琪在年羹堯的授意下，派遣外委千總冶大雄（?-1756）等持賞，前去德格，準備從德格入手，獲取羅蔔藏丹津及藏地的信息：

<sup>60</sup> 清實錄·聖祖實錄(第 6 冊): 790.

<sup>61</sup> 清實錄·聖祖實錄(第 6 冊): 799.

<sup>62</sup> 清代文獻中，德格一詞主要有疊爾格，得爾格幾種寫法。

<sup>63</sup> 雲貴總督高其倬奏陳籌備滇省防務情形折.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 1 輯). 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1997: 164-8.

令該寨頭目遣親信之人前往羅卜藏丹盡所屬之霍耳一帶地方密行探聽,如西海果有蠢動,一面飛報裡塘等處駐防官弁,一面調集番兵堵截要路,果能實心恭順,自當題請授職。<sup>64</sup>

北線獲取羅卜藏丹津信息首先在德格展開。五月,由打箭爐派往霍爾一線探聽信息的蠻頭人沙加,帶回了羅卜藏丹津將聯合霍爾與崗孜(甘孜, Dkar mdzes)周圍那雲並紮喇嘛一同攻打德格的信息。於是,羅卜藏丹津將攻打德格的信息不脛而走。為防止羅卜藏丹津攻破德格一線,進而騷擾理塘已招撫的熟番,岳鐘琪一面令化林協副將張成隆帶兵四百名,調黎雅、峨邊兵丁各二百,木坪土兵五百,駐於瀘定橋防探;一面飛咨周瑛暫住理塘獲取藏地和羅卜藏丹津的信息<sup>65</sup>,北線遂被啟用。德格為防禦羅卜藏丹津的進攻,投誠清廷,成為輔助松潘一線收取羅蔔藏丹津信息的重鎮,六月德格土司給清廷的一封藏文信件中稱:

前日聞得西海眾王子要發兵到我地方來,我所以差人往西海去探聽信息。今差官到我地方的第三日,我差去西海的人也回來了,說西海眾王子議的事情,額爾得呢額爾克沒有來,竹浪兒子病了,竹浪也沒有來,又差人去請竹浪說黃臺吉怎麼吩咐就是了,也沒有來。竹浪又對請的人說我的事情在秋天哩說甚麼話的時候,你們自然聽著,為這個事我的兵馬來不來還不知道。羅不藏丹盡營盤原在阿鑾布勒地方,我的人來的時候,他移了兩天路,在鄂畢駐紮了。眾王子的兵馬都是便宜著的往那裏去,我的人也不知道。這是我盡衷心投的信子。<sup>66</sup>

德格以為清廷採取羅蔔藏丹津在青海之信息為條件,投誠清廷,意圖得到印信號紙。岳鐘琪亦認為利用德格採取羅蔔藏丹津在青海的動態,結合青海西寧及松潘二線採取的信息可以很好的分析青海諸臺吉的意圖。於是,周瑛「領川兵兩千名,由打箭爐出口,自霍爾、甘孜一

<sup>64</sup> 四川提督岳鐘琪奏陳西海附近目前情勢折,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1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 237.

<sup>65</sup> 同上.

<sup>66</sup> 四川提督岳鐘琪奏陳的革情願歸誠效力折,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1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 343-4.遺憾的是筆者並沒有找到這封信件的藏文版本,不能一一還原漢文中的人名和地名.

帶招撫未順番夷」<sup>67</sup>，北線隨之開通，成為了清朝獲取藏地信息的另一通道。

綜上所述，康藏通道及其相關網絡體系逐步得到完善，在清朝以後西藏善後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724年，在平定羅布藏丹津叛亂時，時為管理打箭爐稅課事務扎薩克喇嘛（*da jiyān lu-i ba-i baita cifu* *be kadalame icihiyara jasak lama*）粗勒齊木藏布拉木占巴及副官依特格爾便向清廷報告了在巴爾喀木等地動員康區各大寺院、第巴準備與準格爾決一死戰的告示，這份告示由理塘堪布桑結羣培（*sanggiei cuimpil*）所遣的所南（*sonam*）、昂噶（*angg'a*）送至打箭爐處，由粗勒齊木藏布拉木占巴等翻譯後呈報清廷<sup>68</sup>。由此可見，打箭爐一線啓用後在清廷獲取西藏地方及蒙古諸部的信息方面的重要作用。1727年，為探聽康濟肅被殺的確切情況。岳鐘琪因擔心內地與西藏「相隔甚遠，凡有緊要奏折，皆系唐古特之人賚送，恐伊等稽遲迨誤」，遴選四川提標中通曉藏語、熟諳「彝情」的千總吳鎮前往理塘、巴塘、乍丫、察木多駐防，傳遞奏報，并探聽西藏消息，時時奏報<sup>69</sup>，這為清朝了解西藏地方情形，進一步採取行動提供了信息支持。

除去探聽信息外，康藏通道的啓用及相關機構的設置，對於清廷探索藏地知識大有裨益。雍正元年，粗勒齊木藏布拉木占巴依令調查嘉雪彭噶（*rgyal shod phan bkā*，在今那曲比如縣境內）喇嘛名號及寺廟名稱呈報清廷。這些準確的信息使清廷與那曲地區的彭噶朗嘉林（*Phan bkā rnam rgyal gling*）寺洛桑絳巴（*Blo bzang byams pa*）建立了聯繫，這一聯繫為清軍入藏和作戰提供了相應的烏拉支持<sup>70</sup>。

## 結論

清朝初年，康雍二帝及邊疆大吏對藏地信息知識的興趣與獲取主要源於清中央政府用兵西藏，其交通驛站的經營主要是為入藏轉運糧餉兵丁、經營西藏地方政府而服務。在此背景下，康藏通道三條支線均啓用和建設於對西藏的重大軍事行動中——西爐之役、驅準保藏、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等。在這一過程中，康藏通道在輸送藏地信息知識方面的作用日益顯著。在此背景下，清朝首先通過西爐之戰直接統

<sup>67</sup> 西藏研究編輯部編，*西藏誌·衛藏通誌合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24。

<sup>68</sup>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8輯）：580-5。

<sup>69</sup>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岳鐘琪等奏康濟肅被殺即派兵在裏塘等處坐塘急遞西藏文報探聽消息折*，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383-4。

<sup>70</sup> *Rdo rje tshe brtan, Bod gyi yig tshags phyogs bsgrigs* (1)。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479；《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中）：1006。

治打箭爐後，派遣喇嘛和官員常駐打箭爐管理實事務和探聽消息，這是康藏打箭爐至中渡一線形成之始。其次，在驅準保藏行動中，由於西寧一線探聽消息路線屢屢受挫，準噶爾不斷利用打箭爐一線收取清朝方面消息的背景下，打箭爐南線和滇藏一線作為重要的信息知識收取通道得以正式開辟；最後，在平羅不藏丹津叛亂行動中，清廷又巧妙利用德格等打箭爐北線之地收取羅蔔藏丹津在青海的動態，北線信息知識傳遞通道隨之開辟。同時，康藏通道的啓用和建設，又為清廷在整個青藏高原的信息知識信息網絡體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撐。

